

自由的文化维度及其限度

杨建坡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6)

摘要: 人类文化的不断生成是一个自由进程, 一切符号性思维和符号性活动都是精神自由创造的展示。精神的自由创造和实现必须以符号为中介并将自身注入符号构造的整体活动之中, 因而人类精神劳作的符号构造进程就呈现为一个自由进程。在这一进程中, 作为符号对象性存在的人摆脱直接的物理感性世界的束缚而跃入符号化的无限性的文化世界。通过精神劳作人类进入自由领域并把自己确证为一个自由的存在。

关键词: 卡西尔; 文化困境; 自由; 符号

中图分类号: B5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0246 (2020) 09-0039-08

文化问题关乎人的生存与价值。人是创造文化并通过文化生成自身的存在者, “人的生存不仅是一个客观性存在的问题, 而且还是一个客观性价值的问题”^①, 因此文化的伦理问题与自由问题具有内在逻辑关系。卡西尔在康德哲学基础上所实现的“符号学转向”, 就是要通过对人类精神原则的考察将文化确立为一种真实同一性, 从而确证“文化不能以必然性的方式去界定和说明, 它必须以自由的方式去界定”^②。文章将分析卡西尔是如何完成这一论证的, 或者说, 人之自由的文化逻辑是什么。

一、文化进程即自由进程

在卡西尔看来, 以自由的方式来理解文化, 只能在伦理意义而非形而上学意义上。但是由于文化问题与伦理实践问题并不在一个逻辑层面, 其“不能被还原为准则和规范”^③。那么如何打通彼此界限确定二者的关系及特性呢? 卡西尔从康德那里出发, 认为康德严格区分了人类心灵的不同领域与不同功能, 而对历史哲学问题与伦理实践问题未做实质性区分。相反, 康德却致力于从人类文明的不同形式和偶然性之中寻求一个具有独特性、决定性的问题, 即人类历史的最终归宿或最高追求问题, 这个问题的解决只能诉诸道德原则。在康德看来, 伦理和历史都奠基于一个基本观念, 它们都只不过是“自由”这个普遍性主题的不同表现和解释。“人类历史的真正和最终目的就是理性的自由。”^④ 因此, 文化哲学问题就发生了转移, 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变为: 凭借何种方式通达自由? 这一问题只要诉诸康德的目的论或道德主义就可得到回答, 即人是目的, 人类是注定要奔赴自由这个主要目的的。这是一个蕴藏在道德之中的道德目的, 我们只有在伦理体系中才能找到真正的历史发展原则和文化哲学原则。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专项任务项目 (19JD710042);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项目 (2019-CXTD-07)。

作者简介: 杨建坡,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 文化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

- ① 卡西尔 《符号 神话 文化》, 李小兵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88 年, 第 33 页。
- ② 卡西尔 《符号 神话 文化》, 李小兵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88 年, 第 35 页。
- ③ 卡西尔 《符号 神话 文化》, 李小兵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88 年, 第 35 页。
- ④ 卡西尔 《符号 神话 文化》, 李小兵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88 年, 第 36 页。

卡西尔指出,自由的观念在康德那里是所有历史哲学问题和文化问题的基础。既然自由意味着理性的自律,那么回答文化哲学的普遍目的问题,就需要先回答“人类是如何在人类文明的演化中达到自由的”。在康德看来,自由既是人类文明的起点也是文明的终点,在自由的实现中,在理性的自由要求不断转换为现实的进程中,人类历史得以展开其丰富性。但卡西尔认为,不能把文化问题限定在康德所划定的理性范围之内,因为理性不能解决所有文化问题。事实上,康德在面对艺术、宗教等问题时就已经面临突破知性与真理的规定与界限难题。在处理艺术问题时超越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的范围而诉诸判断力功能;在着手宗教问题时仍将宗教囿于纯粹理性范围之内,将具体的宗教发展历史和宗教生活排除出去而无法理解,隔断了对宗教有起源意义的神秘或神话思维与宗教的密切联系,从而丧失了哲学理解的整体性和普遍意义。面对这一难题,卡西尔认为必须超越康德批判唯心主义界限,将问题置于对文化的功能性理解之中。卡西尔认为,在康德那里已经出现了这种思维趋向,将艺术与道德伦理的区别理解为功能上的不同,将二者统一于超越实在思维的功能思维之上,也即超越物理实在联系的符号功能联系。艺术之美绝非道德本身但却可视为道德的符号。通过艺术之美,人的心智功能被呈现并使经验个体超越至人类心智层面,进而将人类心智升华为对普遍人性理想的奔赴与投身,从而通过“理性的理想”这一基础将艺术与道德的界限融贯汇通。

与康德的道德主义路径不同,黑格尔从意识现象领域通过精神原则来沟通自由与必然,即从客观精神和绝对精神原则对自由与必然进行哲学把握。在黑格尔看来,自由的概念只有借助精神原则才能被充分定义与准确理解,真正的自由概念不能囿于康德道德范围,应该将其理解为绝对精神的最终目的和最高追求这一理想的精神历程。因此,自由不是一个意识事实或有待证明的“信念”,而是一个不断展开的创造和获得的进程,也就是说,自由只有通过精神的自我实现或自我展开才能被达到或被获取。卡西尔认为,黑格尔对自由的理解阐明了自由与艺术、宗教等人类诸文化形式之间的本质联系,即作为自由原则的精神只有在文化的创造活动中才能实现自身、返回自身,相反人类精神文化的创生与发展过程就是自由精神原则的灌注与展示。在黑格尔那里,艺术、宗教等精神形式不过是绝对精神自我发展的不同的、必然的阶段,这些文化形式被精神原则统一为一个人类精神图景或精神轮廓。在黑格尔的这个精神图谱中,不同内容或同一内容的不同成分都被视为必然的东西,而必然的就视为自由的,自由与必然融合统一。但问题是,这种必然性的自由必然地导致了精神的绝对自由,也必然地导向“宿命论”。因此,“我们无论是用形而上学方式还是以历史的自然主义的和宿命论的体系,都不能界定和说明这一统一。因为它并非一给定的东西,它是一个理念,一个理想。他必须以动态的意义而不是静态的意义去理解。它必须被创造出来,而文化之根本意义及其伦理价值就包含在这种创造中”^①。精神必须通过实现其自身的自由以便占有这种自由,文化的所有创生与不断发展就是这个自我实现的过程。

因此,在卡西尔看来,“文化的进程即是自由意识之进程”^②。文化就是符号形式的集合。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哲学不是引导人类获得绝对的知识,而是探得人类思想进程的“语法与句法”,它所提供的对人类思想不同形式和各种功能的综合考察,获得对这些人类普遍精神形式的一般规则。对人类精神考察就不得不通过人类精神的表达方式与途径即符号,因为符号构造与符号化生存是人的生存方式。而“只要人类真正使符号形式发生作用,他便参与了每个符号形式所固有的、作为其基础的自由潜能”^③。因此,作为“符号动物”的人类不可避免要走进符号构造进程,而这一进程就是在精神劳作推动下的符号思维原则的展开。

① 卡西尔《符号神话文化》,李小兵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41页。

② 卡西尔《符号神话文化》,李小兵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41页。

③ 佩茨沃德《符号、文化、城市:文化批判哲学五题》,邓文华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1页。

二、精神劳作即自由创造

在卡西尔看来，“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①，而所有符号化的“思维”和“行为”都是人的精神的“劳作”（work）成果，都是人的精神的对象化。由此，“人的突出特征，人与众不同的标志，既不是他的形而上学本性也不是他的物理本性，而是人的劳作。正是这种劳作，正是这种人类活动的体系，规定和划定了‘人性’的圆周。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都是这个圆的组成部分和各个扇面。”^②“劳作”概念是我们理解卡西尔的“自由”概念的切入点。需要指出的是，卡西尔要求对“劳作”概念的理解要摆脱“实体性”思维而确立“功能性”观念，将这一符号创造能力视为创生性的、实践性的人的精神外化的本质活动。作为实践意义上的“劳作”，所表达的是人的自发的、能动的符号性创造活动，是人类通过这一能力不断创生文化世界从而由物理世界跃入符号世界的动态过程。而这一活动具有本原意义，人和自己所创造的文化符号世界之间是彼此生成的一体关系，人通过符号世界超越物理世界及其自身的有限性束缚，进入符号的无限的可能世界，从而获得自由。要理解卡西尔的自由问题，还必须深入到“精神”——“劳作”——“自由”的内在逻辑之中。

第一，作为生命的精神。继承近代以来的理性原则，特别是不满意于康德对理性精神的限制，黑格尔在其“概念论”的“主观概念”环节揭示出“概念”这个有“自由”和生命力的精神形式，并将“概念”这一带有生命和自由的精神形式扩大到精神整体，把它提升为展示精神之具体生命的载体，成为精神自身的真正的实体性因素。卡西尔抓住康德知识论核心和精髓，继承康德的“先验图式”范畴思想，把“图式”扩展为“符号”。同时也吸收了结构主义语言学思想，借鉴了“格式塔（Gestalt）”心理学的“形式”概念等，但主要是对康德“图式”范畴的形式改造和内容扩充。卡西尔的“符号”是人类精神的对象化，是人类建构自己符号宇宙的精神结构和先验能力。需要提及的是，卡西尔在理解“生命”时，吸收上述黑格尔强调“概念”这一“精神”形式的思想，从而将“精神”（Geist）、“生命”（Leben）统一于符号形式之中。正如维莱纳所指出的，在论及哲学人类学中“精神”“生命”二元论时，卡西尔声称，如果精神和生命被看做具有不同秩序而不是被看做相互对立的实体性本体，那么这种二元论是可以被克服的。精神可以被理解为生命通过返回自身而产生的一个变体。^③因此，只有借助“精神”概念的原则，卡西尔才能真正通过符号这一中介将康德关于现象界的“知识批判”扩大至精神全体的“文化批判”，从而将生命与精神融通。也就是说，精神只有在符号中才能自我呈现和自我实现。

在卡西尔看来，人类精神力量的开启、展示与展现、实现具有本源性的构造作用，是一种建构力量，这种建构力量具有多维性和丰富性，只有通过符号化、形式化才能有所作为，只有寓于符号形式之中才能实现自身并发挥构造作用，进而张扬生命力量。同时，符号形式必须内涵了各种精神力量才能成为真正的符号，才能发挥整理世界、建构意义的形式化构造作用。这就是精神与符号之间的彼此交互生成性关系，这一关系非但没有限制精神反而彰显了精神的自由规定。精神具有独立性和创造性，因而就具有主动性和自由性。在符号中的自我开启和力量显现就是独立的自由的创造性力量的体现。在卡西尔看来，精神的这种能动性和自由就是“生命”。“生命”是既涵盖生物生命、人类生命也包括精神的一切表达或携带意义的文化形式。在此意义上，“生命”既在神话、宗教、语言、艺

① 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38页。

② 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96页。

③ Donald Phillip Verene, "Kant, Hegel, Cassirer: The Origins of the Philosophy of Symbolic Form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 30, No. 1, Jan. - Mar., 1969, pp. 33-46.

术、科学等文化的不同形式之中展示，也要通过人类内在的感官体验和丰富的情感表达等精神形式来展现。

对卡西尔来说，生命是自由的生命，自由是生命的自由。而将自由与生命真正统一起来的还是精神，无精神注入的自由就是无生命的东西，无生命的东西也就不具有独立性和能动性，因而也就不可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因此，当且仅当精神的自由原则注入人类的活动之中的时候，生命的价值和旨向才开显。换言之，生命的本质自由特征，不在于精神的被给予的载体，而是生命内在包含着独立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在于更为根本的具有自我生发、自我创生能力的“原现象（Urphänomen）”。必须指出，只有在生命的这种纯粹性的本源性的直接性的“原现象”活动中，才能理解和把握精神的本质，才能揭示出精神与生命的内在直接的统一性特性。

需要明确的是，生命的这种本源性、直接性和能动性、创造性并不表明它非形式化、非构造性，而恰恰意味着它具有秩序性和构型性，生命与精神形式是一个生成性的统一整体。事实上，“生命”概念揭示的正是作为建构能力和赋形力量的人的精神能力与自然自在的感性存在之间贯通一体的“合一”性关系。在卡西尔看来，生命自身具有的丰富的感性特性为精神自身的自由自在的展开提供了场所保证，而精神的形式性特征既赋予了生命以主体性的意向，也从根本上断绝了那种把生命理解为纯粹的、单一的感性存在者抑或是非理性存在者的旧有思维路向。总而言之，生命绝不是干瘪的、空乏的被动存在而是一个丰富的、意义充盈的整体性存在。生命作为整体，其存在是能动的有机体，是以自身为原因的独立主体，生命所彰显的正是一切精神性活动和存在的自由特性。

“生命”本身所具有的纯粹的本源的创造性的精神能力和自由特性是先验意义和逻辑在先，或者用黑格尔的话说还是“潜在的”“未实现的”。那么，如何实现呢？这就需要符号的创造性活动，即“劳作”。

第二，作为创造性的“劳作”与作为理念性的自由。在卡西尔看来，“劳作”是人类符号性创造活动，如果说“生命”具有“原现象”的自体地位的话，那么“劳作”就属于“生命”的表达，对一切文化形式存在来说仍然属于自体意义上的创生活动，是人类一切文化形式和人类符号作品的根据。本质而言，卡西尔是将劳作当做符号的构造性活动本身来看待的，人类的神话、艺术、科学、历史等一切文化形式就是劳作活动的产物与结果；人类的一切精神形式、文化作品也都是劳作这种符号创造的实现和展现。在卡西尔看来，单纯的沉思不能构成人类对现实进行精神性组织的核心出发点或基点，只有劳作才能构成此基点。也正是在精神的劳作之中，主体与客体的分界线才逐步明晰，人的世界和物的世界的区分才开始出现。因此精神劳作的意识功能进展越远，物我之分也就愈加清晰和明显。因此，如前所述，人与万物区分的标志就在于劳作，正是劳作将人的特性彰显出来，人通过劳作摆脱掉或超越出了自然界、物理界的有限性和单一性而跃入符号世界、文化世界的无限性和丰富性。

由上文可知，人凭借精神的劳作而通往自由的符号世界、文化世界。需要指出的是，在卡西尔那里，自由是精神劳作对物理性、经验性的因果秩序的克服与超越，对一切意义化的世界存在具有先验性和本体性。这种精神的劳作是生命的源发力量，也是精神的自发能量表达，因而具有强烈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是一种构造能力和赋形力量。因此，卡西尔视域中的自由是一种精神的独立活动，是一种精神的表达，更是一个“理念”设定与构造力量。

从上述对“精神”——“劳作”——“自由”内在逻辑展开可见卡西尔对自由的独特理解。卡西尔极大地发挥了康德的“图式”概念，也继承了康德“人为自然界立法”的精神的构造和创设能力。因此，卡西尔的自由具有能动性和创造性，是通过创造文化世界或者更进一步说是属人的世界而实现自由之目的。而精神劳作这一创设活动只有通过符号形式活动才能完成，即精神的自由只有通过符号构型活动才能表达与实现。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精神的表达是生命的源初意味，是生命的进程和绵延，在这个意义上，符号的表达或者说精神的自由之路是一个整体性的本源性的文化世界建构进程。因此，一方面这种人类精神的符号表达具有生存意义或者人类学意义，因而这种自由具有理想性和完

满性；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其唯心主义的自我性或理念性，因而这种自由具有纯粹性和非实践性。

三、文化形式即自由之路

卡西尔证明，人类文化的进程是一个由符号为中介的人类不断创造文化而实现自由的进程。“没有符号系统，人的生活就一定会像柏拉图著名比喻中的那个洞穴中的囚徒，人的生活就会被限定在他的生物需要和实际利益的范围内，就会找不到通向‘理想世界’的道路——这个理想世界是由宗教、艺术、哲学、科学从各个不同的方面为他开放的。”^①这一论断表明：第一，人不同于一般生物，不愿生活在“洞穴”之中，并且人类具备摆脱物理世界的能力与特性；第二，人类摆脱物理属性、经验世界束缚的能力正在于符号构造能力或者是精神的劳作（work）；第三，凭借精神之劳作（work），人类打开了通往文化世界或者属人世界的通道，或者说是创造了一个人化的、符号化的世界，人类在不断创造神话、艺术、科学等诸文化形式的过程中构建了自己的文化世界，从而获得精神的自由和自身的实现。由此，在卡西尔那里，人的符号属性、自由追求和文化世界构造是同一个进程的不同侧面。

卡西尔认为，符号文化是符号功能的结构表达，二者具有结构统一性和功能整体性，是人类精神的符号化建构和形式化表达。但作为精神力量表达的符号文化结构不仅仅是一种功能的建构力量，还内含着对自由追求的价值尺度。因此，人类精神在符号的创造性构造活动中以人性为“焦点”向四周展开为不同的“扇面”，这些“扇面”展示人类超越物理世界跃向不同的维度，但不管这些维度多么复杂与多变，也不论其向无限性做何种延展和发展，其“焦点”和结构是不变的和稳定的，因而呈现出不同变奏的和谐一致。

这样一来，卡西尔就克服了康德对纯粹理性的科学、实践理性的伦理与作为判断力的美学的严格分离，将科学、宗教、艺术等人类不同的文化形式通过上述“焦点”统一起来凝聚为一个形式不一和功能多元的整体。这些文化的不同形式是人类精神的多种表达，在人类的精神结构中具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和功能作用，但这些文化形式不是随意拼凑和彼此隔离的，而是在符号功能的统一作用下围绕一个目标聚焦一个焦点的“多”中的“一”，而这个“一”就是人性的根本和本质的展现——自由。因此，“在文化的构造过程中，人的生命与文化创造是内在一体的，人的生命非但不是被动意识建构反而是精神的自主建构，从而通过知识的建构将文化秩序与精神原则注入人的意识。在意识本身和自我意识之中，不存在一个统治有机体进程的命运之神或外部力量。由此我们进入了无限的疆域，可以说每一种‘符号形式’的真正的、最高的成就正在于对自由目标的接近；换言之，人类的每一种符号形式都是以自己的方式和途径，由‘自然’的领地向着‘自由’的疆域而跃进的努力。”^②这里再次说明，人通过自身的符号特性凭借制造和使用符号将自己从自然物理经验和内在自然生命冲动的束缚和支配中超越出来，产生符号自我意识和符号对象化意识，从而设定抽象的价值目的和生命目标，进而遵循生命内在尺度和精神原则独立的能动的构造客体和表达自我，通过不同的符号形式建构稳定的结构与秩序。在卡西尔看来，符号形式是人的精神表达和生命实现，文化形式和文化世界是人追求自由的进程和结构。也就是说，人类追求自由必须通过符号文化的表达才有可能，而人类符号文化世界的建构与发展也正是人类追求自由的限度和自由本身。

人的精神和文化形式是一个结构性、功能性的复杂与多重整体，这就决定人类文化形式的多样性、丰富性和多维性、无限性，这也就表明了人类通往自由的方式和途径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更表征着自由本身的多维性和无限性。在卡西尔看来，不同的文化形式是人类通过符号能力组织情感、直觉

^① 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57页。

^② Ernest Cassirer, *The Philosophy of Symbolic Forms. v. 4, The Metaphysics of Symbolic Form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11.

和思维的不同表达方式,赋予人类的情感、直观和思维以不同的符号形式,使之结构化和秩序化,从而使人类摆脱混乱无秩序的状态,获得情感表达的自由、直观呈现的自由和思维建构的自由。

在文化符号的诸形式中,人类神话早期产生的符号形式,其客观化的功能特征和趋势已初步显露,并已经打破了动物意义上的自然一体的原始状态。神话中的情感已迥然不同于动物的情感表达,已经蕴含着人的自由意识的萌芽。宗教将人类的情感由被动向主动转变,使人逐渐摆脱神话阶段的情感冲动的纯粹自发性、盲目性,以符号的创设作用对情感进行组织建构,使内在的自发的感情冲动和自由表达获得稳固的秩序,从而在内部构造一个具有自身结构和秩序的情感世界。作为符号形式的语言是一个人类理智和符号建构功能的飞跃,为人类开辟出一个全新视野,使人超出情感的表达而进入抽象的对象化表达层次,从而摆脱自然生命的盲目性和直接性而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独立性。因此,语言使人真正获得情感交流、愿望表达和思想交互的自由。在卡西尔看来,“艺术并不是对一个现成的即予的实在的单纯复写。它是导向对事物和人类生活得出客观见解的途径之一。它不是对实在的模仿,而是对实在的发现”^①。艺术向我们开启了导向自由的路径,艺术是对自然的再发现,这一发现既是对实在的强化,更是对实在之无限性的呈现。当人们陶醉于艺术形式之中时,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立即变得模糊与融合,人们超越了单纯的物理存在和主观的个人世界而进入想象的艺术形式的普遍性之中,从而获得内在的自由。作为人类理智成就的拱心石,科学是人的智力发展中的最后一步,是人类文化最高最独特的成就。^②在科学中,人的符号思维和符号活动能力的自发性和创造性达到顶点,人的精神的主体性得到充分张扬,人具备了完全摆脱外在自然事物的实体性束缚的能力,彻底摆脱了内在的自然生命冲动的盲目支配,跃升到综合化和普遍化的符号宇宙,成为完全自由自主的人。

此外,由于人类自身精神的发展表现为历时性和共时性特征,人类的自由也呈现出多样化和阶段性。在历时性上,人类的精神呈现为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的过程,表现为一个不断展开的逻辑进程,相应的就表征着人类的自由程度也呈现为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逻辑进展,表现出不同的水平层次;在共时性上,人类的精神表现为无限的多样性和无限的复杂性,相应的就显示出人类的自由也呈现出多维性和多样性。当然,由于文化的差异性和地域性,人类自由的程度和向度也表现出异质性和独特性。质言之,文化的不同阶段代表了人类符号能力的进展进化和符号化水平的发展。人类文化的进展也呈现出否定之否定的扬弃逻辑展开,是一个继承创新和不断扬弃的历史进程。

因此,在语言、宗教、艺术、科学中,人所能做的就是建造他自己的宇宙。而这个宇宙的建造根本的源自人类精神的自发性、构造性、创造性力量。正是通过人所具有的这种自发性、构造性、创造性力量,人才通过文化符号形式的建构摆脱感性世界的束缚,跃升为真正意义上的自由的人。在卡西尔看来,人除了通过符号形式之中介而通达无限性、通向自由之外,别无他途。

四、文化悲剧与自由限度

如果说卡西尔在达沃斯与海德格尔辩论中强调符号形式的永恒性,那么后期卡西尔则更加意识到文化的脆弱性并在《人文科学的逻辑》中专题讨论“文化悲剧”。按照佩茨沃德的观点,卡西尔将西美尔所感受到的现代文化的危机“移入”到符号性形式的辩证法中,揭示了文化的悲剧性。“作为一个整体看,人类文化不仅证实了面对生命洪流的失败与悲剧性的缺陷,而且作为符号生成过程来看,文化同样是生活的批评与探究所需要的一种潜能。”^③作为精神作品或成果的文化的确实具有两面性,现代西方哲学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从马克思出发对文化的异化问题进行了深刻批判。例如本雅明对现

① 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198页。

② 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286页。

③ 佩茨沃德《符号、文化、城市:文化批判哲学五题》,邓文华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9页。

代性所具有的张力与冲突的强调与思考，在他而言，文化的灾难性是必然。

实际上，在卡西尔的自由观中内含着“文化两面性”逻辑，或称“符号辩证法”。这就使得卡西尔的自由理论具有内在的逻辑张力和现实的伦理价值而呈现出较强的时代意义。应当强调的是，在卡西尔看来，即便具有符号构造能力，人也不能一蹴而就达到无限性，无限性是一个不断创构和不断完成的过程。卡西尔深刻指出“文明绝不是一种和谐和自我封闭的整体，而是充满了最为激烈的内部矛盾的。”^① 人类文化形式一旦被创造出来，就时刻面临被异化的危险。卡西尔在《国家的神话》中将人类灾祸与重大危机与神话思维这一文化形式联系起来揭示了文化的阴暗面。卡西尔认为，在重大的社会和政治危机时期，被一般符号形式的构造所规约的神话力量脱离约束机制，被释放和张扬出来，并沦为极权主义政客的工具，被用来创造“政治神话”。佩茨沃德认为，正是从对文化阴暗面的揭示中，卡西尔的文化哲学转向了文化批评，力图揭露现代社会所面临的文化灾难。循着这一思路，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者，甚至后现代主义们都对现代性的问题进行了文化角度的反思与批判。但是，这里我们仅按照卡西尔的自由逻辑探讨几方面现代社会的文化异化现象。

第一，卡西尔证明，人类对自由的追求之路只有在精神劳作的符号创造性中才能实现，却受制于符号异化。从自由的内在机理来看，自由本质上是由人的直接的感性阶段转向抽象的意义整体的先验条件或先验能力，因此它非但不依赖于感性因素反而要借助符号化来摆脱它；但是从产生过程来看，自由必须借助直接具体而感性的符号表达方变得可能。这样的后果是：随着人类的发展，人类精神所创造的符号世界必然日益丰富、愈加庞大，并越来越独立成为一种强大力量来束缚人、压迫人。这就成为“文化悲剧”或“文化异化”。文化异化主要表现为：人类为了追求自由而创造了各种文化，但是作为个体的人却难以抵抗日益强大的独立的文化，这些文化产物反而支配人、束缚人、压抑人，使人产生渺小、脆弱之感。

第二，卡西尔认为，生命的表达和精神的劳作具有直接性和整体性。作为符号形式的文化一旦产生就脱离人的生命而反过来要求人的生命依附于它。这一问题在资本逻辑中表现尤为突出，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社会现象。这就是当代的“符号拜物教”现象。何谓拜物教？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详细论述“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因此，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做拜物教。”^② 概括言之，资本条件下的拜物教就是“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③。在这里，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控制下的物的异化现象：人通过劳动生产了商品这个物，而由于在资本的控制下物与物的关系掩盖了人与人的关系，物反倒成为控制人、奴役人的神圣者。虽然从起源来讲，拜物教源自原始宗教或原始神话思维，但在现代社会，拜物教现象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受市场经济影响，追求物的占有或物的消费的物质主义现象大行其道。在卡西尔的符号形式哲学看来，人具有符号创造和对象化特性，人的生存过程就是不断创造符号文化世界的历程，人与符号世界是彼此生成的整体性关系。可以说，人的生存与发展一方面是在创造符号系统或者对世界进行符号化操作；另一方面人也就生活在自己所构造的文化符号世界之中。因此，符号化是人的生活方式，人也只有在符号系统的创造中才能生存和获得精神张扬。但是，随着人类和社会的发展，人类文化形式的外在化、神圣化为一种强制力量，就是符号拜物教。符号拜物教是符号异化现象的一种表现。在现代社会，受资本的效用原则和增殖原则的影响，文化被上升为一种物的力量，就成为一种符号的拜物教，这是一种文化的“资本化”，是一种符号意义的“物化”，是对人的精神力量的戕害和对生命的

① 卡西尔《人文科学的逻辑》，沉晖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89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0页。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9页。

自由意义的抽离。

第三,卡西尔承认,人类的精神必须通过符号活动才能自我展现和实现。在对象化的符号活动中,人性的焦点是“圆心”,不同符号形式是“扇面”,表征人类追求自由的不同方向和不同程度。“圆心”与“扇面”通过有秩序性的符号形式和意义的建构与不断重复而保持内在同一,从而使人类追求自由的符号活动具有方向的一致性和内在的稳定性。在社会活动中,人的符号性交往活动以自我为中心展开,通过社会或社群的意义创生及重复活动实现自我认同,这是人的精神表达和符号化生存的前提,否则人会陷入焦虑而使价值与自由无从彰显。由于人的活动首先是一种文化的建构活动,是一种社会或社群的意义创生或重复活动,这本身就赋予人自身的身份确证或自我认同力量,从而保持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稳定一致的彼此关系。但这种人高度自我认同的社会在人与人的关系存在依附或压制关系时是难以达到的。马克思对这样的社会进行了美好描绘:在那里,工业高度发达,社会生产出足够的产品,通过组织分配以满足全体成员的需要,“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会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①。因此,自我的发展不仅在于身份的认同和不断转换,还在于自我的选择能力和现实适应能力,更在于充分地身份选择和对现实自我的充分敞开和表达。

在资本逻辑中,社会消费化,符号表意和意义嫁接过于随意,符号运用和符号系统过于泛滥;人的社会角色和身份被肆意制作和过度消费,随意标识与无限放大;身份自由变成身份沦陷,自我实现沦为自我迷失,身份认同和自我认同被虚无化、异己化,自我陷入危机。雅斯贝尔斯曾深刻指出:“今天的人失去了家园,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他们生存在一个只不过是历史决定的、变化着的状况之中。存在的基础仿佛已被打碎。”^②随着符号世界的更加复杂化、丰富化,人们脱离自我的不安之感也就愈加剧烈,越来越落入自我的空虚深谷之中。总之,在资本的效用原则和增殖原则作用下,现代社会造就了无与伦比的物质景观,社会符号系统日益庞大与纷繁复杂,人们面临的符号选择与身份变换不断加剧,使自我囿于不能重构的焦虑和身份困顿的牢笼,人通过文化走向自由的道路面临被阻断的危险。

责任编辑:马妮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7页。

^② 雅斯贝尔斯《时代的精神状况》,王德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2页。